



凤凰周刊文丛

Classified File

机密档 ②

被遮蔽的历史

凤凰周刊 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凤凰周刊文丛

Classified File

机密档②

被遮蔽的历史

凤凰周刊 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密档 (1、2) / 凤凰周刊编. —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11

(凤凰周刊文丛)

ISBN 978-7-80234-693-2

I. ①机… II. ①凤… III. ①中国历史: 现代史—史料
IV. ①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1645号

书 名: 机密档 (1、2)

著作责任者: 凤凰周刊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693-2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643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1、2)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84604601 84604602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箱: 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Chapter 08

历史的现场

我亲历了中以建交全过程
芷江受降的历史现场
“我曾是志愿军战俘代表”
中阿关系破裂秘辛
谁打响了西安事变第一枪
苏联红军在东北
国民革命期间的苏联政治顾问
1945年：毛泽东的跟监报告
“国民党干部”时期的毛泽东信函
1937年的延安

我亲历了中以建交全过程

□ 高秋福

1990年之前，对中国来说，以色列一直是个不可涉足的政治禁地，中国12亿人中，有机会亲临其境者几近于无。1989年2月中旬，我奉命赴开罗就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没有想到，自己亲历了与以色列关系发展的重要环节，会在两国建交过程中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

出乎意料的采访令，以色列5分钟办好签证

抵达开罗不到两个月，我就接到新华社总社一封密信：总部在纽约的美国犹太人社团关系理事会邀请你和钱文荣（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于5月初访问以色列。请即到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办理签证。看完这封信，我是既高兴又迷茫。高兴的是，要去访问一个相当神秘的国家，该有多少期待；迷茫的是，这个理事会是干什么的，邀请我们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国内又有什么考虑和要求？

以色列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来，由于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1956年7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中以两国建交未能实现。但是，以色列一直坚持不同台湾建交，不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揭开新的一页，中以关系的发展出现新的机遇。以色列为摆脱国际上的孤立，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作为外交重要目标。1987年9月，中以两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这是两国政府高级官员首次正式接触。1989年1月，两国外交部长又就两国关系发展问题在法国巴黎会晤。国内批准我们访问以色列，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作出的决定。

我带着护照直奔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在保安措施极其严密的大使馆签证处的玻璃窗口，我把护照和照片递进去。不到5分钟，护照就已办妥。此前我访问过不少国家，但从未如此迅速地拿到过签证。后来才知道，这个使馆几周前就得

到以色列外交部要求给我发放签证的指令，内部的一切手续早已办妥。

5月10日早晨，我登上埃及西奈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以色列的古里安国际机场，开始了这次历史性的访问。

真正邀请人突然从幕后走上前台

先一天陪同钱文荣从纽约赶来的美国犹太人社团关系理事会会长助理曼德尔夫人热情陪同我入住耶路撒冷的拉罗姆饭店。她把一份访问日程表交给我。日程表上印有以色列的国徽，国徽下面则是用希伯来文和英文打印的“以色列外交部”几个字。我立刻意识到，主人身份换了，哈丽特赶忙解释说：“到这里，你们就是以色列外交部的贵宾了。”

钱文荣和我都知道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的厉害，不敢在房间多说话，即装作散步的样子，到街上僻静处坐下来交换意见。我们分析：以色列外交部正在想方设法同中国拉关系，很重视媒体的作用。但如果直接出面，担心我们不会响应。因此，让美国犹太人社团邀请，现在才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以色列外交部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确实是出于对我们来访的重视。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苏赋特后来回忆说：“新华社直属中国国务院。它的人员都是政府官员。而这两位最早的来访者都是资深的高级干部。”当时，我们决定客随主便，不提任何异议。

中午，以色列外交部的二把手、总司长鲁文·麦哈夫主持欢迎午宴。麦哈夫的中文名字叫麦宇仁，前几年曾任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同我驻港人员私下多有接触，还曾以旅游者身份秘密访华。他说，以色列外交部对有机会首次正式接待中国客人来访深感荣幸，他们将尽力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午宴结束后，以色列媒体的记者涌到我的房间。我们本来同哈丽特有言在先：我们是来采访的，不接受别人采访。因此，希望主人对我们的到来不要声张。但是，不知是以色列记者消息灵通，还是主人蓄意要声张，反正是十几家报纸和电台的记者团团将我包围。他们询问我的姓名、来访的目的、停留多长时间、要会见什么人。第二天，以色列主要媒体都发了消息。一家大报登了我的一张大照片，说明是：中国官方记者首次访问以色列，两国关系可望迅即改善。

以外交部长说：如果中方同意，马上签字，5分钟之内建交

5月12日中午，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蒙·佩雷斯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会见我们。当时，以色列是利库德集团和工党联合执政。佩雷斯是工党领袖、联合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他介绍完以色列经济情况后，话题一转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我们非常崇敬中国，崇敬中国革命。

以色列建国之父戴维·本-古里安早就预见到中国的复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你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是你们的敌人。我们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保持敌对关系。我们非常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分歧。他认为，埃及已同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承认了以色列，中国再不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会见的气氛轻松愉快，谈话的方式直截了当，主人的态度热情友好。说实话，佩雷斯对华这样友好，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态度这样积极，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5月14日下午，外交部长阿伦斯在他的办公室会见我们。他认为：“两国关系近来有发展，但非常、非常慢，而如何加快步伐，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如果中国说今天晚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当即就会回答‘同意’，并马上签字，五分钟之内就建交。

但我的印象是，中国方面有所犹豫，因而进展非常缓慢。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做法。当然，慢，总比没有行动好。但我们希望加快步伐。”

结束为期10天紧张而又令人激动的采访，我们总结了以色列各界都希望发展友好关系的第一手情况如实反映到国内。同时，我还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媒体和人士对此的平和反应也报回总社。这些情况和看法受到国内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沙龙说，想到中国看看，等得头发都白了

这次访问后不久，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的代表几次找上门来，邀请我再访以色列。我本想在1989年年底成行，但总社没有同意。国内可能担心访问次数太频繁，干扰双方在暗中进行的外交接触。我国实际上是“一步步来”，谨慎从事，严防过热，以免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不良反应。因此，直到一年后的1990年底，国内才批准我同总分社记者水均益到以色列采访一周。

我们出发之时，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已历时三个月，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调兵遣将，海湾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危险。以色列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海湾危机，但它毕竟是中东地区一个重要国家。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它对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有什么新的考虑？以色列外交部一再催促我们早日成行，也希望向中国转达重要信息。

这次印象最深的是采访了曾任国防部长、时任住房部长的鹰派将军阿里尔·沙龙。沙龙是利库德集团的极右翼代表，但同样希望中以关系加速发展。他抚摸着满头银丝说：“我早就想到中国去看看，等得头发都白了。”他同我们纵论天下大事，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盛情邀请我们去他的农场作客，到那

里听他拉小提琴，看他夫人作画。真没有想到，这位“魔鬼将军”还蛮有幽默感和人情味。

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麦宇仁同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交谈。麦宇仁说，过去一年多时间，两国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了旅游办事处和学术联络处；两个机构最近又授权代发签证，正从民间机构向官方机构过渡，但发展的步子还不够大，“一些顺理成章的步子应尽早迈出去”。他说：“我们知道，中国是一条大船，以色列是一条小船。大船不如小船好掉头。因此，我们不催逼中国。我们对中国的耐心表示理解。”麦宇仁提出，以色列方面对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有五点意见：一，欢迎新华社尽快到以色列建立分社，以色列外交部将提供一切方便。二，希望进一步加强各种人员的交流，有更多的中国人士访问以色列；三，实现两国外交官互访，可暂时以私人身份进行，以色列方面决不声张；四，以色列准备派一个电视摄制组去中国，拍一部介绍中国情况的纪录片。同时，希望中国派艺术团来以色列，京剧团也行，但最好是杂技团；五，以色列外交部已决定派遣前驻荷兰大使泽夫·苏赋特任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特别顾问。说到这里，在场的苏赋特接过话头说，他学习过中文，几十年来一直想到中国去工作。他希望不久的将来成为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

他说：“我知道新华社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我希望通过你们把我们这些想法传达到你们中国各个阶层的读者那里。”麦宇仁显然担心我不理解他的真意，又补充一句：“包括最高层的读者。”他的意思很明白，但我只能淡然表示：“关于这次会见，我们是会报道的。至于稿子怎么发，那就是总社编辑部的事了。”麦宇仁没有说话，好似有点恍然。当晚，副总司长摩西·叶加尔宴请我们。他对我说：“麦宇仁先生的意见很重要，请务必如实报道。以色列对华采取现实态度，当然不能操之过急。但我们毕竟是个没有耐心的民族，不像中国人那样有忍耐力。因此，我们还是希望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快一些，向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向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宴会后，一位懂中文的以色列官员对我说：“高先生，我认为麦宇仁先生今天发表的意见很重要。新华社是否可以通过内参反映给中国领导人。”“内参”二字是用中文讲的。绕了半天圈子，问题就这样终于给挑明了。我故作不解地说：“对不起，我不知你说什么。内参？什么叫内参？”说话人笑笑，有点尴尬，再也没有说什么。

我们还采访了两位著名的巴勒斯坦人士弗雷杰与侯赛尼。他们对中以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都表示理解。弗雷杰认为：“中以两国关系正常化将是正义和理性的胜利。”侯赛尼则说：“如果是过去，我们会把中国同以色列发展关系看成是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事业的叛卖；而现在，形势变化，时代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在设法同以色列打交道，中国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便于对它施加影响。这对我们的事业实际上是一种支持。”我觉得，他们代表了新形

势下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的种种担心看来是没有必要的。

建交的“桃子”争相摘，国防部长访长城引发轩然大波

1991年初，海湾战争结束；这年10月，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在马德里召开。在此前后，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同以色列恢复中断20多年的外交关系。这进一步推动了中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0月份，以色列外交部代表团再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首次正式确认两国在北京有“官方接触”。以色列报纸称“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是时间问题了”。经总社批准，我同总分社副总编辑周则鑫第三次访问以色列。

此时，以色列政府内部的矛盾通过中以关系问题再次爆发。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内矛盾重重，主要分为两大派：以沙米尔总理为首的阿什肯纳齐人（西方犹太人）主流派，以外交部长利维为首的赛法拉迪人（东方犹太人）非主流派。内阁改组时，沙米尔将其亲信阿伦斯从原外交部长职位上调任国防部长，将其另一个亲信内塔尼亚胡调任外交部副部长，以牵制利维。利维在外交部多次同内塔尼亚胡争吵，以至见面互不说话。为缓和矛盾，沙米尔不得不将内塔尼亚胡调出外交部。现在，中国同以色列即将建交，这件事原是由外交部长阿伦斯经手启动的，而现在，只能由现任外交部长利维来“摘桃子”、“政治上得分”。沙米尔不甘心，阿伦斯更不甘心。11月初，阿伦斯抢先一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中国访问。对此，利维事先一无所知。以色列派驻北京的联络处也蒙在鼓里。一天，这位负责人应邀去钓鱼台国宾馆赴宴，但主办单位事先没有说明宴会的主宾是谁。到场后，他发现阿伦斯竟端坐在那里，顿时，目瞪口呆了。访华期间，阿伦斯出去游览，没想到在长城脚下被一位以色列游客认出来，并随手拍下相片，“立此存照”。这位游客颇有计，回国后立即与几家报社联系，以高价将照片卖给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最新消息报》。这家报纸迅即在显要地位刊发，在以色列政界和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了解内幕者由此知道以色列政府内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不了解内幕者单凭表面现象下判断，认为中以建交为期不远了。当然，这也是不错的。

我们到以色列之后得悉，以新任总司长约瑟夫·哈达斯10月份就接受了我外交部访华邀请，但迟迟不动身，是真的有事缠身，还是以内部矛盾激化，在建交问题上另有考虑。这样，哈达斯就成为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哈达斯似乎早已了解中方的担心。他一见面就详细解释暂时难以去北京的原因。他说，第二次中东和会即将于1992年1月末在莫斯科召开。他负责以色列政府代表团的筹备工作，近期实在难以他顾。他诚恳地说：“对此，我希望中方能够谅解。

我可以非常负责地讲，我们早就盼望两国关系正常化，怎么会蓄意拖延呢！”他建议，要么待他能脱身时访华，要么请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先期访问以色列。周则鑫和我一致认为，哈达斯的话是坦率可信的，遂转告有关方面。了解到以色列方面的不便之后，我国外交部主管西亚北非事务的副部长杨福昌遂于12月下半月访问以色列。

我们又采访了外交部长利维。一见面，他就坦诚地说：不要什么采访，还是进行谈话吧。他是首次会见中国记者，看来是想把气氛搞得轻松些，这样，我们就边喝咖啡边谈起来。利维说：“中国国家大，考虑多，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们倒是可以先走第一步。如果你们今天发个邀请来，我明天即动身去北京。两国外交部长一见面，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我一直在等待去中国的那一天。”谈到阿伦斯秘密访华一事，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事前一无所知。是报纸曝光之后，我才知道的。我当即向沙米尔提出抗议。我对他搞这种越顶外交非常反感。”谈到这里，利维把话锋一转，强调说：“但是，我确信，在同中国建交问题上，我同沙米尔总理是没有分歧的，没有矛盾的。在利库德集团同工党之间也是如此。以色列同中国建交，我一定亲自去北京签字。”

“越权”采访沙米尔总理，以首脑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公开表态

这是第三次访问以色列，前两次没能采访到总理沙米尔。根据总社规定，驻外记者采访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只要时间允许，事先应该向总社报告。行前，我为此专门给总社写了报告。但得到总社总编辑室的答复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必采访他。我理解，总编辑室显然认为中以两国关系问题太敏感，采访和报道应持谨慎态度。我就不好再向以方提这个问题。岂料，一到耶路撒冷，全程陪同我们访问的以色列外交部参赞吉拉特就正式相告，他们已安排沙米尔总理会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必要拒绝。即使总社将来追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客随主便，见机行事。

会见是12月3日傍晚在总理府进行的。沙米尔总理一向被认为是“不苟言笑”、“老谋深算”。我们走过警卫人员荷枪而立的长廊，进入显得有点空旷而简朴的总理办公室。只见他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急匆匆朝我们走来。他身材矮小，上躯前躬，头发散乱，西装有点发皱。他看上去土头土脑，憨态可掬。他同我们谈海湾战争之后的中东局势后，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拥有巨大的潜力。因此，以色列对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很有兴趣。他认为，这种友好关系应该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协商，经济上合作，文化上交流。为此，他表示很愿意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以色列，以便坦诚交换意见，增进了解。他说，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沙米尔说：“你们很清楚，我们方面没有任

何问题。这完全由中国政府来决定。我们只是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

这是正式而权威的信息。我们急忙赶回下榻的饭店，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向北京的总社发稿。第二天，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告诉我们，他们从以色列驻北京的联络处获悉，北京的报纸和电台都已刊播我们采访沙米尔总理的报道。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以色列政府首脑通过新闻媒体第一次直接向中国人民讲话，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公开表明以色列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因而非常有意义。

曲径通幽，中以终于建交

1992年1月21日，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利维应邀访问中国。这是以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华。1月24日，利维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从即日起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样，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经过40多年艰苦曲折的历程，两国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回到开罗以后，以色列大使馆举行宴会，邀请我和不少同事参加，共同庆贺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92年3月初，我接到总社要我回国工作的调令。在向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以驻埃使馆的朋友们辞行时，没有料到，我很快接到以政府新闻局局长奥尔默特博士的电话，坚持要我“也要向以色列话别”。这就促成我第四次访问以色列。奥尔默特博士在同我谈话时热情称赞新华社和访问过的记者，说我们是“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先驱者”。我心里当然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在中以两国建交之前几次访问以色列，完全是新华社、是我们国家给的机遇。而我们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国内的指示行事的。

高秋福，1939年8月生，河北省定州市人。曾任外事局副局长、国际部副主任、中东总分社社长。1992年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现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高级记者。🌀

芷江受降的历史现场

□ 徐宗懋

在南京受降之前，中日两军作战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是芷江受降，其目的正是为南京受降做准备。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听候中方的命令。

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接受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的一幕，成为历史性镜头，象征着20世纪中国地位的重大转折。

从百年前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似乎只有屈辱地投降，从来没有光彩地受降，因此南京受降仪式的光辉早已载入史册。不过，在南京受降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芷江受降”也值得一提，它是中日两军作战以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目的正是为南京受降做准备。又由于是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中国官兵的反应更加激烈。

中国决定用最大的阵容来完成洽降手续，让全体中国人分享百年来初次受降的欣悦。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政府目睹了本国国民惨重的死伤。尽管一些激进将领要求再战，喊出“一亿玉碎”（意指全部日本一亿人口都战死），但8月10日裕仁天皇已顺天命，决定投降。请降书由瑞士、瑞典转达到同盟国，一切无条件投降，只要求保留天皇制。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美、英、苏、中四国答复日本，准予保留天皇制，接受其投降请求。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收到日本正式投降电文，当天最高帅统蒋介石即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派当时在广西南宁督战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

8月18日，蒋介石再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必须在21日到达湖南芷江，并规定日方代表不超过5人，飞行航线自汉口机场起飞经常德上空直飞芷江，还规定了乘坐的机型、飞行高度、飞行时间、座机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等。19日，

冈村复电，告以今井武夫座机的联络呼叫频率，并指飞机尾翼将系红布条作为辨识。当天，蒋介石召见何应钦，授权其为中方洽降全权代表，并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新六军的廖辉湘等人加快布置准备。何应钦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政人员，组成庞大的洽降代表团，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前往芷江。换句话说，艰苦抗战八年的中国朝野，决定用最大的阵容来完成洽降手续，扩大宣传，让全体中国人分享百年来初次受降的欣悦。

今井武夫的尴尬沮丧，衬托出的正是四万万中国人的欢欣鼓舞。

8月20日上午，接受到通知的各战区长官包括张发奎、卢汉、余汉谋、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杜聿明等陆续抵达芷江。下午，何应钦、萧毅肃和陆军总部的重要幕僚，行政院顾问团、美国人员及新闻记者50多人，分乘4架运输机，由重庆抵达芷江。当晚，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设立了“陆军前方指挥部”，负责全部受降事宜。由于考虑到日军降使是副参谋长级别，因此决定安排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出面受降，同时也指派新六军政治部少将副主任陈祖贻，改佩少将军衔，负责对日降使的接待和警卫工作。中方完成了所有准备。

8月21日，今井武夫一行从汉口登上一架漆皮脱落、黄绿斑驳的专机，同时由美军飞行员驾驶的3架战斗机由芷江机场起飞，在常德上空对今井的座机进行引航。11时15分，飞机抵达芷江机场，随行的日军人员有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翻译木村辰男，工作人员松原喜八、久保善男、小八童正男、中川正治等8人。飞机缓缓降落后，四周等待的中方人员和新闻记者一拥而上，把飞机团团围住。机舱打开，首先走出的是木村辰男，接着便是冈村的降使今井武夫。头戴拿破仑帽、佩少将军衔、蹬马靴、穿着草绿色哗叽翻领军服的今井，尽管努力保持降使的尊严，但仍难掩落寞之情。

今井武夫，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富士步兵第69联队任士官候补生，后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在日本军参谋本部中国科工作，后任派中国大使馆陆军辅助武官。抗战爆发后，今井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随着战争的进行，今井先后任日本大东亚省参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第二课课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等职。1944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成为冈村宁次的副手。今井长年从事情报工作，掌握中国军政民情，或许他万万无法想到的是，有一天他会成为在中国日军的降使。

今井武夫带着手下及相关文件来到芷江，面对大批中美人员以及此起彼伏的相机“咔嚓”声，其尴尬沮丧衬托出的，正是四万万中国人的欢欣鼓舞。“芷江受降”成为抗战胜利的经典画面。

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听候中方的命令。

今井等人下机验明身份后，先前往指定的帐篷休息，在场的中方人员有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外交部人员邵毓麟、舒适存等人。冷欣以茶水招待今井武夫等人，并略为介绍整个洽降程序。稍后，今井一行被引到两辆插着白旗的美式吉普车，陈祖贻率领宪兵驶离人群，前往今井等人的住所安置。

8月21日下午3时20分，陈祖贻领着降使今井，乘吉普车从住所前往4公里外的受降会场。这是一间长约20米、宽约8米的木房，大厅右边挂着一张孙中山的半身像，国民党旗、国旗两边贴着孙中山的著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像前有排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有如法官的案台。对面摆着另一张桌子和四把漆黑的椅子，作为投降代表的座位。

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盯视下，今井等4人脱帽入室。他们事先已获准佩戴军刀，根据日本军队的习俗以保持作为高级军官的尊严。接着，4人走过空位，对着萧毅肃将军深深一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般挺直地站着。萧毅肃神色严肃地请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然后查询今井等人的身份，并要求今井出示洽降的授权证明。今井略为犹豫，不过随即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正式命令，尚无正式文件，不过今井出示了冈村派他前来洽降的命令副本。参谋桥岛芳雄连忙将此文件呈到萧将军的面前。验明正身后，洽降算是正式开始。

从当时留存的照片看来，面对中国代表以及大批围观的中美人员时，今井等人均面露忧戚之色。事实上，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守候中方的命令。过去半个世纪，日军代表一上桌，全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气焰；如今却是垂头丧气，不复当年之狂妄。对于这样历史性的一幕，现场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愿意错过，不仅室内站满了人，连外头走廊也满是探头张望者，人人屏气凝神，都想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见证这个历史事件。

在众目睽睽之下，今井等人“大和民族高人一等”的虚妄信仰瞬间土崩瓦解。

验明正身后，萧毅肃要求今井武夫交出中国战区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图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于是桥岛打开黄色皮包，将一张有颜色的详图在肖将军的案前展开。

接着便是受降的主要内容，肖将军取出何应钦将军要求今井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由工作人员以中、日、英三种语言高声朗读。由于这种形式表现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威仪，气氛紧绷，今井跟他的随员神色紧张不安。这项备忘录规定在中国战区内，计中国大陆（东北三省受雅尔塔条约之限由苏军控制）、台湾、澎湖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管全部投降。

当时日本在华兵力总计有3个方面军，军团10个，师团36个，独立旅团41个，独立警备队及支队20个，特种兵队6个。至于进一步受降的具体情况，备

忘第四条指出：“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尽速照办！”这份备忘录洋洋洒洒千言之多，中方的翻译将准备好的收据和毛笔墨盒送到今井的桌上。

今井头上冒出汗珠，身旁的副官桥岛芳雄、前川冈雄也是双唇紧闭，如坐针毡。半世纪以来，日本军人被灌输效忠天皇宁死不屈的思想，同时也被教导大和民族高人一等、“支那人”贪生怕死的观念，他们万万想不到有一天必须向他们一向瞧不起的“支那人”缴械投降。特别是洽降现场经过安排，萧毅肃表现的完全是下令投降姿态。

主要仪式历时一小时17分，其中大部分是宣读何应钦将军的投降命令。在众目睽睽之下，今井等人一生虚妄信仰瞬间土崩瓦解。

今井低头看了备忘录几眼，拿起毛笔在收据上写下“今井武夫”，再盖上一枚椭圆形的朱红印章。收据接着由萧将军的翻译收回，今井欲对一些问题提出说明，却遭萧将军婉拒，萧将军说：“关于日军投降应执行之事，除了备忘录所列各项外，有关技术上的细节，另行谈话。我们为贵官安全起见，以后谈话即在贵官住所举行，前来洽谈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所指定的中美军事人员，除此之外，不得与他人洽谈。凡有询问，希望贵官据实答复，现在请退出。”于是桥岛将桌上的备忘录等文件谨慎地收进皮包，今井率随员起身鞠躬离座。

在受降过程中，何应钦身居幕后，待今井离去，何应钦立刻出现在大厅中，听取萧毅肃的报告，检视今井所呈的文件，对受降过程感到满意。

“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三五残破日机，停于萋萋蔓草中，倍觉荒凉”

这天晚上，今井发电南京的冈村宁次，报告芷江洽降的经过，并转达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即将飞往南京成立前进指挥所。

8月22日上午，冷欣将军与美国柏德诺将军、王武上校前往今井武夫住所，就设立南京前进指挥所的相关问题，包括军需物质装备接收以及美军战俘现状、待遇等问题进行了解。23日上午，陆军总部再派员会见今井，确定日本投降正式签字仪式将在南京举行，并要求冈村宁次在冷欣、何应钦等人抵达南京前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下午1时，何应钦在陆军总部的一间客厅接见今井和随员，何应钦问今井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是否收到转交冈村的文件，今井答复明白了，都收到了。在简短的对话后，何应钦最后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于是今井鞠躬退出。下午2时15分，今井等人搭原机离去，结束了在芷江52小时的停留。

这天傍晚，何应钦将军代表陆军总部在受降会场前广场举行欢宴，中美军事首长、新闻界友人皆出席，庆祝芷江受降顺利成功。何应钦与几位军事首长笑逐

颜开，兴奋之情实笔墨难以形容。芷江受降之后，他们将不会返回重庆，而是留在芷江前方司令部加紧接收南京的准备工作。

8月25日，何应钦召集前进指挥所全体官兵训话：“……精神力求振作、仪容力求修饰，服装力求整洁……南京环境复杂，所有赴京人员，应一如战时随时做必要的准备，不可懈怠疏忽。”

26日，总部接收冈村宁次来电：“贵总司令部南京前进指挥所，希在可能范围内迅速前进，其飞行路线、高度、时间，希望能通知本官，以负责对冷欣中将阁下一行人之保护，其无遗憾。”

27日上午8时，冷欣带领前进指挥所官兵，随行人员159人（包括新六军随行人员一部），动用了6架美军飞机由芷江机场起飞。冷欣事后写道：“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上三五残破日机，停于萋萋蔓草中，倍觉荒凉！”

这一回则是今井武夫到机场迎接，此后他担任了冈村宁次的联络官，协助处理日军官兵遣返善后问题。今井武夫后来返回日本，著有《今井武夫回忆录》，详述战争前后历程。冷欣将军亦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抗战回忆专文。

至于芷江一地，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缅怀先人牺牲报国的精神，并永远记得芷江受降此一重要史实，1946年芷江七里桥修建了“受降纪念坊”。近年芷江又连续重修原受降会场，辟为纪念馆。🌀